

周勋初 著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江苏古籍出版社



★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周勋初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著 者：周 勋 初

责任编辑：王 华 宝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如东县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199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3,000

印数：1—1120册

ISBN 7-80519-796-2/I·218

定 价：15.0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 引

研究唐代文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至为发达，曾经提供过不少宝贵的资料。《新唐书》的传记部分出于宋祁之手，宋氏喜欢采录笔记小说入史，《资治通鉴》的情况也差不多，司马光在采录某种资料之后，还经常加以考订，说明去取的原因，后来他又将之编为《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于此可见其寝馈之深。《旧唐书》中也有不少地方引用笔记小说中的材料，例如《唐临传》中“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家童误将绛衣……”一段，全袭《大唐传载》；又如《朱敬则传》中“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一段，全袭《隋唐嘉话》。这就说明，后人若要深入钻研唐代史事，也就一定要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上下功夫。

但是我国古代的文人常有一种偏见。他们重视正史，而对那些提供原始资料的笔记小说，则往往有意忽略，因此很多著作失传了。有些留存下来的文字，经过后人窜改，已与原书有所出入；有的经过书贾改编，更是弄得面目全非。有的本子经过多次传抄，也就产生了不少讹误。后人若要利用这些史料，又得下一番整理的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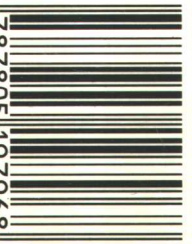
由于前人重视正史，所以历代都有研究新、旧《唐书》的著作问世，到了清代更是出现了不少名著，如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合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岑建功撰《旧唐书逸文》十二卷，沈炳震有《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丁子复有《新旧唐书合钞补正》六卷，王先谦有《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二百六十卷，赵

44 606/10

绍祖有《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而像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八卷之类的专题著作，更是指不胜数。反观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则寂寞无闻。这种情况自然与古时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有关。时至近代，由于西洋学术的输入，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已起根本变化，由轻视转向推崇，从而研究传奇的风气日趋兴盛，但对其产生的源头，那些短小精粹、融文史于一炉的唐人笔记小说，则仍不予重视。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偏颇的观点，不仅妨碍对其本身的探讨，同时也必然会妨碍正史与传奇的研究的深入。所以今天研究唐代文史的人，视野尚须开阔，研究领域尚须拓展。对唐代笔记小说进行认真的整理，深入的研究，以此为中介，可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中闯出一条新路。这本小书便是我在这方面工作的初步结集，希望获得同行的指正。



ISBN 7-80519-796-2



9 787805 197968 >

目 录

小 引

上编：通论

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	1
唐代笔记小说的崛起与传播·····	22
唐代笔记小说的校讎问题·····	68
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 ——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	105

下编：作家作品考

韦绚考·····	113
卢言考·····	119
卢肇考·····	129
赵璘考·····	146
《隋唐嘉话》考·····	165
《明皇十七事》考·····	181
《常侍言旨》考·····	197
《刘幽求传》考·····	208
《酉阳杂俎》考·····	222
《玉堂闲话》考·····	249
《唐语林》考·····	259

后 记

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

“小说”一词，在我国古代文士的笔下往往略含贬义，有人以为某种记载不太可信，也就会以“小说家言”称之。但不管他人怎样对待这种体裁，古今文士还是喜欢写作“小说”，这只要检查历代书目，就可发现“小说类”的著作愈来愈多，而且“小说”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简直有兼收并蓄之势，把其他部类中的许多著作也陆续吸收或融合进去了。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呢？

历代书目中子、史二部的 递为兴衰与相互渗透

中国学术最重源流之辨，而考古代学术分类的源头，则又必须上溯《汉书·艺文志》中所作的学派区分。班固沿用刘歆《七略》的成果，删取其要而成六“略”。《诸子略》中，分列儒、道、阴阳、法、名、墨、从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小说”一家就显得很特殊。因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有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各类著作。战国之时，百家蜂起，西汉之时承其馀绪，仍有各派人物在活动，因此刘歆、班固等人按照各派宗旨进行分类，也就指明了我国学术源流的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十家之中前面九“家”都有其明确的宗旨，可以列出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杂家”与儒、墨、名、法等家有

所区别，未能独标宗旨，但仍有其代表性的著作——《吕氏春秋》二十六篇。颜师古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书的历史地位，联系当时形势就可明白。战国之末，由秦统一天下之势已很明显，学术界也就出现了统一思想的要求。首先反映这一趋势的，就是秦国的权相吕不韦，他集合了各学派中人物编成《吕氏春秋》一书，所以《汉书·艺文志》“杂家”的小序中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师古曰：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见王治之无不贯，（师古曰：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此其所长也。”可见先秦各家都有用世之意，“杂家”则是为适应一统天下的政局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的学派。吸收各派之长，为建立新的政权服务，这也就是他们独树一帜的学术宗旨。①

“小说家”的情况就不同了，《汉书·艺文志》小序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自莠在夫之议也。

刘、班给“小说”下的定义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亦即并非出于上层人物之口，显然评价很低，这是后人常以贬义称呼“小说”的原因。刘、班在《诸子略》的序中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小说家言既不能用以经世，又不能形成一种具有明确宗旨的学派，这在重视政治实用价值的古时学者看来，地位当然不高了。刘、班一方面说“诸子十家”，一方面又说“可观者九家而已”，似乎“小说”不成其为“家”，这种处理方式

本身就显示出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或许刘、班嫌这种“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小说”内容太浅薄，可又难于归入其他类别中去，而小说家所表达的一些见解仍不失为某一方面的议论，因而不得不归入《诸子略》中去的吧。

但上述评语中仍有对“小说”加以肯定的地方。班固引用孔子之语证成自己的见解。按“小道可观”之词原出《论语·子张》，实为子夏之语，汉人行文习惯，可以归为其师先圣之语。班固引此，也只是借此提高自己立论的权威性就是了。因为儒家所理解的“小道”之中究竟包含不包含“小说”，无法加以证明，但这一评价却为“小说”在学术领域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后世文士纷纷写作“小说”，也可聊当“刍蕘狂夫之议”。

与班固同时的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从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一江淹《拟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评语约略相同。时至东汉，儒家之外的学派均遭排斥，难以经世了，小说更是说不上有什么治国之用，因此只能用于“治身理家”，但这样说却也承认了“小说”自有其价值。

《汉书·艺文志》中共著录了小说十五家。根据书名和班固自注，可以约略推知其内容。中如《伊尹说》二十七篇，《师旷》六篇，《天乙》三篇，《黄帝说》四十篇，班固以为皆出后人依托。《鬻子说》十九篇，《务成子》十一篇，妄称古人，均为后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或称“考周事”，或称“古史官记事”，其内容当近于史部中的“杂史”一类，或许由于《汉书·艺文志》中只有《春秋》一类。而没有单列史部，而《春秋》又在《六艺略》中，所以刘、班才把上述诸书分到《诸子略》的“小说家”中去的吧。同类著作还有《臣寿周纪》七篇，顾名思义，当与上述诸书情况相同。

“小说家类”中还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注：“孙卿道，宋子，其

言黄老意。”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什么不把此书列入道家中去呢？“道家”类中不是已经收入了许多黄老学派的著作么？看来此书内容也有“迂诞”的问题，和《黄帝说》类同，故而列入“小说家”类。同类之中还有《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也当属于“黄老”一派。此书之前为《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刘向《别录》称饶为“齐人”，大约也是一名燕齐方士。燕齐方士每以黄老学派的面目出现。《封禅方说》十八篇之出于方士，更不待言。

《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当以《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虞初”成了小说家的代称。班固说他为“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颜师古也说：“《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按《文选》载张衡此赋，李善引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说明虞初本身也是一名方士，小说之中包括着好些怪诞的方术。《汉书·艺文志》与《文选》注中还引应劭释《虞初周说》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则又可知这些文字与杂史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今《逸周书》中仍有很多怪诞的记载，如《王会》篇等即是。^②

由此可知汉代学者对“小说”一词的理解：“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中包含着许多非现实生活中所有之事，按其内容而言，虽然不能列入可以经世的学派，但也应该算是学术中的一种流派。因此刘、班等人以此列入《诸子略》中，还是合适的。

这十五种书中的文字，今已遗佚殆尽，其中《百家》百三十九卷，唐时尚存，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虫篇》中说：“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可惜他没有明确说明引用过其中的哪些材料，以致后人无法窥测其内容。

鲁迅在研究了上述诸书的性质之后说：“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

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可见小说自始起其内容就介于子、史之间。

以上是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所作的考察。大家知道，记录古代著作的书目，除《汉书·艺文志》外，要以《隋书·经籍志》为重要，因为前者著录了先秦至西汉末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后者续此而作，著录了东汉之后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二者互补，先唐时期学术界的情况可以约略觐知。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作体例有巨大差别，因为前者是把古代学术分为六类而著录的，后者是按四部区分即经、史、子、集四类而著录的。这两种体例在我国学术史上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只是从魏代起，四部分类法逐步占了上风，并在皇家书库的编目中世代相沿成了定式。

这种情况又是怎样出现的呢？

四部分类法的取代七略分类法，并不说明前者优而后者劣。二者的产生各有其具体的情况，只是随着学术界各类著作的发展，自然地形成了这一趋势。战国之时，百家争鸣，西汉时期，流风餘韵尚存，因此刘、班在《六艺略》后首列《诸子略》，按儒、道、阴阳、法……各家排列。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其他学派势难再有重大发展，因此诸子类的著作逐渐萎缩。钱大昕《答问》十曰：“隋唐以后叙书目者，大事循经、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释道、方技而一之。”（《潜研堂文集》卷十三）这种情况正好与史部书籍的蓬勃发展成一鲜明对比。

先秦至西汉时，史学未兴，《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仅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等数种才是真正的史书。因为数量太少了，班固只能将之附于《春秋》类中。但自东汉起，史部著作层出不穷，而且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类型，后人再要把这不属门类的大量著作归入《春秋》类，无疑是不合适的。史部的单独成类，乃事势之所必然。

后人也曾想在《七略》的基础上略作调整，解决上述难题，例如宋秘书丞王俭撰《七志》四十卷，一曰《经典志》，记六艺、小学、史记、杂传。“杂传”而称“经典”，首先就会给人以“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感觉，强行扭合，势难为人接受。梁处士阮孝绪撰《七录》十二卷，采纳王俭《七志》中改《六艺》为《经典》的意见，首列“《经典录》内篇一”，但他把史部从中移出，而独标为“《纪传录》内篇二”，可见他顺应时势，根据实际情况，采纳了四部分类法中的合理成分。在王、阮以前，魏秘书郎郑默撰《中经》，首创四部分类之法，按经、子、史、集排列，晋光禄大夫秘书监荀勖撰《中经新簿》，已将次序改为经、史、子、集，这一变动，也反映了史部的蓬勃发展 and 子部的不断衰落。

唐代史学对小说的影响

到了唐代，史部著作愈趋发达，这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自汉末至隋末，战乱相寻，前后长达四个世纪之久。这与两汉时期政权的延续前后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大体保持稳定的情况相比，反差太强烈了。后代政权为什么越来越不稳，值得深入思考。而且朝代更迭频繁，黄缘际会的权谋之士处处逢源，而恪守儒家准则的忠贞之士则每横遭厄运，这样也就颠倒了原先的价值标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以致人心浮动，政权不稳。儒家重史学，立意重在正人心，垂鉴戒。“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李渊父子建立新的政权之后，自然想到应该发扬古代的史官传统，藉修史以巩固政权了。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曰：

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杂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

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曰：“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然而简牒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③

李渊调集了当时地位最为尊显的官员如萧瑀等人，以及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文士如令狐德棻、颜师古等人，负责编纂前代历史。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直到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合称《五代纪传》，诏藏于秘阁。这是皇家主持修史的成功尝试。新政权建立之后，命宰相领衔，征集其时著名文士，纂修前代历史，这在后来整个封建社会中，也就成了常规。

贞观十七年，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魏徵主持编纂《经籍志》。后因《五代纪传》分别行世，《经籍志》附于《隋书》，故名《隋书·经籍志》。由于这一原因，《志》中反映了唐初中秘书和梁代存书的情况。

唐太宗的重视修史，其热忱远超乃父。他想得更为深远一些。隋文帝统一天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但仅历两代，即告覆灭。李氏政权是在隋末动乱后的废墟上建立的。李世民自十八岁起就参与征战，历尽艰辛，才建立起大一统的天下。他目睹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力，深谙古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古训的深刻涵义，因此自他接任皇位始，就常与臣下研讨历代成败兴衰之理，尤其是隋代二世而亡的教训，更使他亟欲加以总结并引为鉴戒。吴兢《贞观政要·君道》等章中详叙他与魏徵等人探讨历代兴亡的言论，可见其时君臣上下对此问题的关注。这种以古为鉴的共同心态，也就促成了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贞观政要·任贤》记太宗曰：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以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宝此三镜，以防己过。^④

为此他在继承高祖遗志组织人员完成了前五史的写作之后，又在贞观二十年命长孙无忌等人组织人员重修《晋书》。书成之后，他又为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人撰写传论，因此此书又以“御撰”的名义行世。由此可见他对史学的重视。^⑤

上述种种，可见唐初史学之盛，远迈往古。修史人员地位之高，也非前代可比。唐高宗对简择史官人选曾有明确的指示：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说正有闻，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⑥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人自然以任史官为荣了。在朝任职的官员也竟以兼任史职为荣，《史通·史官建置》曰：“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薛元超为薛收之子，自是唐初的高门士族，《隋唐嘉话》卷中记其言论曰：

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⑦

由此可见修史之事在唐代士人心目中的地位。翻阅有关唐代的图书目录，知李肇撰有《国史补》三卷，卢肇撰有《逸史》三卷，林恩撰有《补国史》十卷，高彦休撰有《唐阙史》三卷，高若拙撰有《后史补》三卷，……诸书均以“史”字命名，也就反映出了一种共通的心理，即不能任史职而又企羡修史之事，以“补”国史之“阙”自命。

其他一些书籍虽不用有关“史”字命名，实则也与修史之事有关。例如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一卷，追记其父李吉甫从柳冕处听来的高力士所口述的十七条有关玄宗的轶闻，进呈文宗，且云：

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惟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郑荣撰《开天传信记》，序曰：

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服膺简策，管窥王业，参于闻听，或有阙焉。承平之盛，不可殒坠，辄因簿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

显然，郑荣著书的目的也在“备史官之阙”。

《论语·卫灵公》曰：“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唐代文士纷纷著书“以备史官之阙”，援孔子之语以占身份，也为这类杂史或小说体裁的著作找到了定位的根据。

史家的职业道德，首先就在记录之事真实可信。郑荣也是以此自期的。但检查《开天传信记》中的记载，却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情况，例如其中有许多关于一行、罗公远、万回师、叶法善、无畏等人的神异故事，颇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宗旨相违，按例是不应作为史实看待的，郑荣却大量录入。这些当然与武后、玄宗时期崇信佛徒、方士有关，因而民间流行的怪异传闻，也为意欲阑入史家的短书所采入。这正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丛残小语”。例如其中有一则曰：

一行将卒，留物一封，命弟子进于上。发而视之，乃蜀当归也。上初不论，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

一行奇人，精于天文历数，故当时即多有关其预言后验的记载，《松窗杂录》、《大唐传载》等书都说他曾预言“陛下行幸万里”，玄宗幸蜀至万里桥后方悟。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乐府·胡旋女》自注则又以为出于纬书记载。可见这一类传说当时流行很广。

情况表明，随着唐代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文士的史学观念也

起了很大的变化。李德裕在上《次柳氏旧闻》的表中提到，柳璟以为其祖柳芳从高力士处听来的某些秘闻，“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但李德裕还是把许多神异之事录下进上，“以备史官之阙”。因此，李肇在《国史补》卷下《韩沈良史才》中说：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肇为之赞，他们规仿史书撰写小说，也就充分说明了唐代史部领域的扩大，以致某些小说具有史传的内容与形式，甚至使二者难以严格区分。另一方面，则又可以发现史部著作也正纷纷向小说方面发展，从而形成了后世所说的笔记小说与传奇这类文学体裁的繁荣。

刘知几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期从事国史编纂。他对前此的著述多有不满，于是结合唐初修史的实际，总结编纂工作的经验，写成《史通》二十卷。他在《采撰》篇中批评了前代史家征引史料时多方面的缺失，而对《晋书》尤为不满，云是“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宝）、邓（粲）之所美除，王（隐）、虞（预）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无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通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显然，刘知几是反对史籍采纳小说的，随后他对史家何以如此的原因也作了分析，特别指摘文士中普遍存在的喜好奇异之弊，所谓“……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轳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此之乖滥，往往有旃。故作者恶道听涂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夫以刍蕘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